

质疑中国史前三种“多元一体”说

裴安平

自汉代司马迁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就一直推崇并延续着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一统论的思想和观念。今天，这一理论和观念在考古学界不仅得到继承，还于时间与内涵二方面都有扩展。其中，史前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论的提出就是时间延伸的代表；而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源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等理论的提出，则是充实内涵的代表。

然而，中国考古却发现这些思想与理论的提出都不符合历史事实，都值得商榷。

一、中国史前的考古学文化只“多元”无“一体”

1987年，严文明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存在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论，认为“中原”就是中心，所有的考古学文化就结成为“多元一体”的“玫瑰花瓣形结构”；2000年，赵辉先生又再次论证了这一结构的存在，并进一步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原具有地理位置的中心性，二是当地考古学文化优势的发展状态及其吸引力¹。此外，也有专家认为：相互交流多了就成为了一体²。

然而，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只“多元”而无“一体”。

（一）考古学文化的历史不等于人类的历史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多元一体”理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神话了考古学文化，不仅将考古学文化当作复原和研究史前历史的载体和平台，而且还将考古学文化视为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既会搞“多元一体”，又会搞“玫瑰花瓣形结构”，还会影响文明起源³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⁴。

但是，考古学文化在人类历史研究中充满了局限性，完全不能与人类的组织和历史相提并论。

1、考古学文化的本质完全是物质的。

所有的考古学文化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一群有特色的遗迹遗物构成的共同体，都是坛坛罐罐和墓葬、房址、灰坑等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完全没有生命力，既不会相互主动制造“多元”，也不会相互整合制造“一体”，更不会因交流多了“多元”就成了“一体”。

虽然这种物质遗存及其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连带反映了某些人类的历史与变化，但反映是被动地，根本改变不了它的物质本性。

2、在史前人类的视野中，实际并没有“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

历史表明，自有人类以来就从来没有在“考古学文化”的旗帜下一起从事过采集、农业、

1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北京：《文物》，1987年，第3期；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北京：《文物》，2000年，第1期；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北京：《文物》2006年，第8期。

2 李新伟：《考古学探寻中国史前文化》，北京：《人民日报》，2019年11月5日，第20版。

3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北京：《求是》，2022年，第14期。

4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北京：《文物》，1987年，第3期。

手工业，一起从事过文明和国家的起源。“考古学文化”完全是身外之物，人们相互之间除了血缘与婚姻关系以外，谁都不会因为使用了相似的陶器和石器而成为“亲戚”或朋友，或因为交流多了就成了“一体”。虽然它也是当时的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物质遗存的相似性与共性，对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存在任何影响。今天，人们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纯粹只是对一定时空范围内有一定共性的物质遗存的主观认识，一种纯地缘化的宏观的逻辑概括。

3、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体是人，是人与人联合构成的各种社会组织。

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是要复原并研究人的历史。虽然史前的人和组织今天都隐藏在了考古学遗迹遗物或考古学文化的背后，但这并不是考古学文化与人与人类组织可以相互替代的理由。人就是人，物就是物。物性的考古学文化永远不会创造历史，更不会主动实时地推动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历史必须“由物及人”，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社会组织为基本研究对象⁵。千万不能用物态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替代了对人和人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所。

4、考古学文化本身也是人类创造的。

正如考古学文化中的各种陶器、石器、玉器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而不是考古学文化本身进步的结果。因为考古学文化没有生命力，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推动考古学文化的进步，如何才能使它们“多元”，如何才能使它们的交流促成“一体”。

5、考古学文化就是地域范围广阔的地缘化概念。

史前聚落群聚形态⁶和民族学的调查⁷表明，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不仅以血缘为基础为纽带，而且规模与分布地域都很小，远远不及考古学文化。与此同时，中国考古还证明，史前古国的规模与地域范围也远远小于当地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如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分布面积就超过了3.65万平方公里，而境内的“良渚古国”则约110平方公里⁸。

因此，要复原史前社会，不仅不能将考古学文化当作复原与研究人类历史的载体与平台，也不能用地缘化的考古学文化的现象和特点来作为根据，更不能将考古学文化的整体就当作当时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

（二）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

事实上，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本质上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的人类社会环境共同促成的。

所谓自然的地理环境，实际就是相对独立且适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型自然地理单元。在新石器时代，主要就是适合农耕的平原、盆地与河网地带，如长江中游江汉与洞庭湖的两湖平原及周边的低山丘陵区。由于地势开阔、平坦、土壤肥沃，那里长期都是新石器时代形成考古学文化的最佳区域。又由于适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型自然地理单元都各自独立特点不同，所以各自形成的考古学文化也特点互异。于是，在自然地理条件互有差异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各成员独立平等的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

不过，仅有自然地形地貌这一单独的条件还不足以促成并维护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因为考古学文化都是人创造的，观察考古学文化现象不能就事论事，还必须看到隐藏在后面的人类社会与活动。事实表明，血缘社会永远也造不出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的“中心”。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当时的社会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初始且自然的社会，即母系氏族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无论组织规模大小一律独立平等各自为政，没有一个人期望自己所在的文化能成为众多考古学文化的“中心”，也没有一个人期望通过交流使众多独立的考

⁵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⁶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⁷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⁸ 周薇等：《刚刚，中国又多了一项世界遗产》，中国新闻网，2019年7月6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19/07-06/8885951.shtml>。

古学文化都整合成“一体”。新石器晚期，虽然社会进入了父系时代，人与人，聚落与聚落，聚落组织与组织之间都出现了等级地位分化。但是，当时的考古学文化并未受到影响，因为它的内部包括了众多独立平等的血缘组织，也没有一个组织具有“一体”的能力。随后，古国也出现了。但是，它们都以小型血缘组织为基础，组织规模也不大⁹，社会的动员能力也仅限于有关组织本身的范围内，所以也无力影响考古学文化“多元”并存的大局，更没有造就出“中心”文化的能力。今天，学术界很多学者都认为当时“良渚古国”已经出现了，并成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标志¹⁰；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看到古国所在的良渚文化为此打破了“多元”的格局，或升级成为了“中心”文化。显然，史前不同时段的社会环境也是考古学文化“多元”历史现象的“自然”缔造者和守护人。

此外，还由于生产力低下，又没有交通工具，所以史前人们相互交流和影响的范围也往往就长期局限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如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这样超大型的自然地理单元范围内，以致域内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往往互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和因素。因此，这完全是属于一种没有任何社会原因形成的自然文化交流圈。这种交流圈，一方面，其中所有的成员所有的考古学文化都是独立平等的；另一方面，既没有“玫瑰花瓣形结构”，也没有以中原为“中心”；再一方面，相互只认识和熟悉，没有相互依存。

值得注意的是，相互交流永远也不可能推动和造就考古学文化的“一体”现象。诚如今天的中美关系，虽然无论交流的质和量都远远超过了史前考古学文化相互交流的范围，但人们之间依然是“洋装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香港，张明敏歌词）。这说明交流只是一种相互关系的表现，只能改变外在有关物质文化的形态，改变不了“多元”内在的社会性质与特点。

因此，那种以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存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玫瑰花瓣形结构”实际就是将自然的文化交流圈理解成为了一种人为的社会地位高低分化的政治结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曲解。

（三）史前根本就没有考古学文化的“一体”现象

考古发现，史前考古学文化带“中心”的“一体”现象不仅是现代人为的一种政治景观，而且也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

1、地理位置的“中心”性并不会必然地导致“中心”性文化的出现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拥有先进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地理位置“中心”性地区的专利。

距今9—7千年，长江中游彭头山与皂市下层文化的影响就遍及长江中下游与淮河流域¹¹；距今6.5千年，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的白陶也遍及长江中下游与珠江流域¹²。距今5千年以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足迹更遍及大半个中国¹³。这表明拥有先进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地理位置“中心”性地区的专利，也没有一个地方因为拥有先进的文化因素就升级成为了“中心”性文化；或相反，接受了它的影响就变成了低等级的边缘卫星文化。

第二，拥有先进文化因素的地区不等于就必然拥有先进的社会发展阶段。

距今6千年左右，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器型和彩陶的确影响面很广，但考古却发现当时整个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却明显落后于长江中游地区。因为，长江中游地区

⁹ 裴安平：《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71-506页。

¹⁰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国家文物局，2019年7月6日，

https://mp.weixin.qq.com/s/Cro_T7RaXng8z7a6NUHy2Q。

¹¹ 南京博物院等：《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¹² 裴安平：《环珠江口地区咸头岭文化类型的序列与文化性质》，厦门：《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128页。

¹³ 王 巍：《良渚文化玉琮刍议》，北京：《考古》，1986年，第11期。

发现了当时中国最早的带水濠沟¹⁴，发现了中国当时最早的城址和最早拥有水濠加土垣双重防御体系的城址¹⁵，发现了当时中国最早有二个聚落入驻的城址¹⁶，还发现了当时中国数量最多的城址¹⁷。

显然，长江中游地区这些社会发展最早的先进记录表明，地理位置的中心性不仅与文化的“中心”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可能还造就出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心。

第三，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并不会只往“中心”走。

关于“中心”的意义，有专家认为关键就在于它处的那个位置使它可以吸收各个地方文化的优点，也对各个文化产生影响¹⁸。

不过，由于地域临近的原因，不同时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确有文化交流圈和传统的文化交流地的现象，如长江三峡地区就多受两湖地区的影响。但是，各地的文化从来没有出现过只“吸收各地文化的优点”的考古学文化和有关历史现象，更没有出现过不仅吸收各地的文化“优点”还同时“对各个文化”都“产生影响”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现象。屈家岭文化之所以会占据河南半壁江山¹⁹，郑州地区之所以会出现大量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因素²⁰，就说明史前的“交流”和“影响”是不分“中心”和边缘的，地理位置的中心性也不是“交流”和“影响”中心的必备条件和基础。

2、考古学文化“一体”的性质与特点

考古表明，中国史前只见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而“一体”现象则始见于夏代。

史前之所以不见考古学文化的“一体”现象，关键就在于血缘社会没有任何人和组织有能力影响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人有能力造出“中心”文化。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文明起源了，在实力的帮助下，小型独立分散平等的血缘社会组织踏上了不断整合大型化一体化的不归路。距今约8千年出现了一体化的聚落群（相当部落）（图1：1、2），距今约5千年出现了一体化的聚落群团（相当永久性部落联盟）（图1：3、4、5），距今约4.5千年出现了超大型的血缘组织聚落集团（图1：6、7、8）和早期国家，还出现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古国。不过，由于古国的组织单位都是小型的血缘组织，压迫和剥削的对象都是“氏族奴”（血缘组织）²¹，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古国有力量改变所在考古学文化的地位，改变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没有一个古国有力量占据“中心”的位置，所谓“良渚古国”即如此。

距今4千年，中国历史发生了许多新的重大变化。

第一，第一次出现了实体民族。

一般而言，民族是在一定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可分二种类型。一类是自然民族，各组织成员独立分散；另一类是实体民族，各组织成员已整合成一种利益一体化的共同体。

自然民族是所有民族的基础，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一方面是不同的自然环境促成的结果，以致同一地区的人在外形、语言、饮食、生活习惯、心理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自然民族所涉及的人类组织基本上都是同一地区相互独立平等分散的血缘组织；再一方面，也是地域邻近，长期相互交流的结果，以致同一地区的人都不自觉地拥有相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不自觉地在同一使用同一种考古学文化。但是，在史前，那些人的自

14 郭伟民：《澧县城头山考古发现史前城墙与濠沟》，北京：《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22日。

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16 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察报告》，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古代文明》第4卷，2005年，第391-412页。

17 裴安平：《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48-450页。

18 中国考古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严文明先生访谈》，2014年3月7日，
<http://www.kaogu.cn/html/cn/kaogurenwu/renwuzhuanfang/2014/0304/45455.html>。

19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郑州：《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2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21 裴安平：《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95页；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然属性与有关文化的同一性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因为当时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相应的生产生活实体完全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人们只认血缘，不认坛坛罐罐和它们组成的考古学文化。

随着社会的文明化，聚落组织的大型化一体化和国家的起源；又随着人类社会不断由血缘转向地缘；尤其是随着一些实力强劲的古国的崛起，以往不同的独立的血缘族体与社会组织，要么被征服，如晋南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²²（图 2：3）；要么为了生存也为了利益，大

²² 佟伟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展》，北京：《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61-37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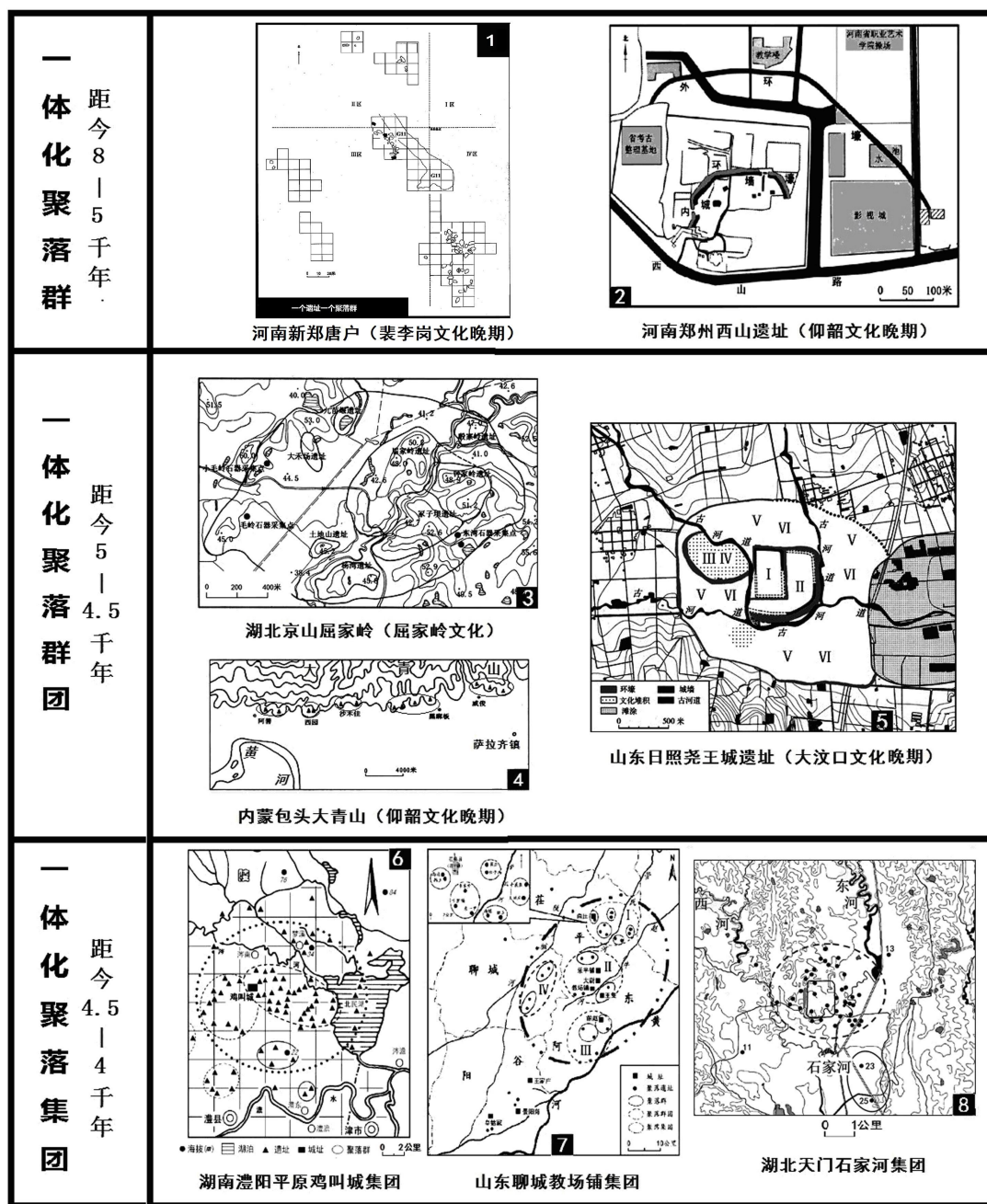


图 1：史前聚落群聚形态演变示意图

（1 引自：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2 引自：张玉石《郑州西山古城发掘记》；3 引自：湖北考古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报告》；4 引自：田广金《北方考古文集》；5 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6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7 引自：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8 引自：湖北考古所《大洪山

南麓中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

家跨血缘跨地域纵横连横整合成一种新型的利益一体化的大型社会共同体。于是，自然状态的民族就开始升级成为了一种地缘化的社会共同体，成为了具有明显统一领导与管理特点的实体民族。

实际上，女真族文武并举的统一与建国过程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单一民族国家诞生过程的重复与再现。明代末年努尔哈赤之前的女真族就是一个自然状态的民族，“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恩格斯《起源》P89），一盘散沙。然而，努尔哈赤又文又武，既合纵连横又武力征服，在统一女真以后整个自然民族就变成了一体化的实体民族；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正式建立了单一民族国家,国号“大金”(史称“后金”)23。

第二,出现了单一民族国家,即“早期方国”,

随着夏民族的崛起,中国历史也首次出现了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早期方国”,夏即如此。

这种国家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国家的组织主体是单一民族;二是一地之国,分布地域广大,远远超过了以血缘组织为建国主体的古国,据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位置,夏的总面积不小于2万平方公里(根据分布范围计算);三是国体地缘化而政体却是血缘化的,周时期之所以要“封建亲戚”即源于此。

第三,出现了考古学文化、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历史现象。

由于国家的组织单位和统治力量都以地缘化的实体民族为单位,所以考古与文献记载一致表明,早期方国历史性的第一次具有了国家主体、民族、考古学文化“三位一体”的现象。其中,夏国的主体范围就与夏民族的主要分布与居住区域,与夏人所创造的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基本重合。

在中国,考古学对夏商周三代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的定义也明显与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不同,如夏鼐先生对夏文化的定义就是:夏王朝时期由夏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24。由此可见,考古学文化、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完全是历史时期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

正因此,中国史前根本没有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现象,考古学文化的“一体”现象完全是文明起源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的政治制度。它不仅与自然文化交流圈形成的原因、时间、性质不同,而且还显示“多元”与“一体”完全是属性不同的历史现象。既不能将二者视为同时期共存的历史现象,也不能将“多元”视为“一体”的基础,更不能将二者都视为互有因果关系。

二、中国史前的文明起源只“多元”无“一体”

1986年,严文明先生就认为: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一发展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及其特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25。

今天,文明起源“多元一体”也已成为“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26。

有人认为:自史前时期即已确立多元一体格局27。

有人认为: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各主要文化区整体上呈现出百花齐放、多元并进的局面。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各地区之间交流日益密切,内容包括生产技术、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出现过以彩陶扩张和玉礼器传播为标志的大范围文化整合过程;距今4500年以来,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并率先发展的趋势;距今3800年前后,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28。

有人认为:由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在核心的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

23 梁振晶:《赫图阿拉城“尊号台”遗址建筑格局及相关问题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24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25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北京:《文物》,1987年,第3期。

26 王巍:《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北京:《人民日报》,2022年7月4日,第9版。

27 360问答:《为什么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https://wenda.so.com/q/1538808775611239>。

28 王巍:《中华文明具有三大特征》,中国新闻网,2012年5月22日,
<https://wenku.baidu.com/view/02295725482fb4daa58d4b7f.html>。

明社会。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地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史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²⁹。

然而，考古发现，上述理论论述都与事实不符。

（一）史前文明起源的“多元”是自然现象

中国史前的文明起源之所以是“多元”的，与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一样，导致的原因也有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二种。

由于地理的原因，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自然特点，因而孕育的考古学文化与文明起源也互有特色；如江南浙江良渚文化的玉料就多透闪石-阳起石，而北方地带陕西神木石峁的玉料则有很多的“布丁石”³⁰。这就说明两地的玉料很有本土个性，来源也明显本土化。

与此同时，人类整体的自然社会环境更是导致文明起源“多元”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史前是自然的血缘社会，血缘组织规模都很小，占地面积也很小，所以在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范围内就常见同时有多个文明起源点的现象，如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就发现城址至少 17 座³¹，分别代表了 17 个实力强劲的独立血缘组织的崛起。这不仅说明整个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就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文明的起源也是“多元”的。

显然，地理与社会的自然因素对文明起源“多元”的影响和作用都十分明显。

（二）“一体”是社会文明化进步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多元一体”的现象。其中，早期形态就是以中原为中心，各地民族和文化就环绕在周边，夏民族夏国夏文化就是这种历史现象的代表；晚期形态就是“多元”归一，文化的“多元”现象接近消失，汉代汉文化一统天下就是代表。

不过，无论是早期的“多元一体”还是晚期的“多元”归一，实际都是社会文明化不断发展与进步的结果，而不是起源“多元”化的结果。

第一，“一体”化不仅是文明起源，而且还是人类文明化进步最重要的标志。

考古表明，“一体”化就是文明起源最重要的社会变化特点³²。

从距今约 8 千年开始，聚落群（相当部落）首先一体化，新式的实力管理开始与传统血缘长辈管理并存，聚落成员地位分化，主从关系分明。其中，“主”就住在壕沟以内，“从”就住在壕沟以外（图 1：1）。

距今约 5 千年，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政治组织即一体化聚落群团（永久性部落联盟）登上历史舞台（图 1：3、4、5）。其之所以是政治组织，皆由于这是历史上第一种同血缘而又跨部落的永久性社会组织，没有以往的血缘长辈管理，只有在实力基础上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于是，历史上第一代政治中心就出现了。

距今约 4.5 千年，一种超大型的同血缘的聚落组织即一体化聚落集团（图 1：6、7、8）出现了。只要同血缘，无论近亲远亲皆可成为组织成员。与此同时，一种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的早期国家也出现了。考古发现，它完全是不同血缘社会组织相互合纵连横以图做强做大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古国也在这一时段出现了。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面貌，不仅说明人类已站在进入地缘社会的大门口了，而且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

29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北京：《文物》，1987 年，第 3 期。

3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年。

31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42 页；

江汉教育网：《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阳凤凰咀遗址》，2019 年 11 月 20 日 <https://www.hanjiangq.com/post/4854.html>；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华容县七星墩遗址 2018 年调查、勘探和发掘简报》，北京：《考古》，2021 年，第 2 期。

32 裴安平：《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345-444 页。

剥削的统治关系。不过，古国的组织单位还都是小型的血缘组织，压迫和剥削的对象都是“氏族奴”（即血缘组织）³³；所以，当时就根本没有一个古国有实力能改变所在考古学文化的地位，改变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一个古国有实力占据所在考古学文化的“中心”位置，如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虽然面积在长江中游属最大，120 万平方米，但它却根本不是长江中游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的“中心”。

但是，从夏开始，包括夏商周三代，由于实体民族的崛起，单一民族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体组织单位。于是，社会地缘化了，并出现了地域广阔实力强劲的“早期方国”，出现了“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史记·黄帝本纪》）和“禹会诸侯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的政治中心。于是，一个以中原为政治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时代开始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争霸，多民族国家和阶级国家即“晚期方国”出现了。于是，在秦统一六国以及“书同文，车同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基础上，社会的文明化又进入到了一个各地的文化特点和差异几乎全都消退模糊，而汉代的汉文化完全一统天下的新时代。

人类的组织和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小到大，从分散到整合，从血缘到地缘，从“多元”到“一体”。所以，“多元”是文明起源的特点，而“一体”则是文明发展的收获，这就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第二，“一体”化政治中心的出现完全不是文明起源“多元”推动的结果。

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和实证。

根据文献与考古，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实际包含了豫西与晋南二个部分，且各自都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其一，这二个部分史前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却明显是“二元”的。其中，豫西是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图 2：1），而晋南则是山西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图 2：2）³⁴。其二，由于河南新密新砦还发现了介于当地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遗存³⁵，从而表明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最早源头是在河南而不是山西。其三，二地史前晚期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古国，即洛阳盆地古国³⁶、临汾盆地古国³⁷，显示了相互的独立与强悍实力。因此，晋南成为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区的主要原因就可能还是暴力与战争使然。

对此，佟伟华先生在《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张》一文中就有很好的论述³⁸，并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向北扩展实际还经历了前后二个阶段（图 2：3）。第一阶段，首先在山西芮城盆地、垣曲盆地建立根据地；第二阶段，在运城盆地、临汾盆地降服土著以后，再与之融为一体。

很明显，在夏国建立和夏文化的拓展过程中，就根本不见其它“多元”文化的助力。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说明，中国社会文明“一体”化的历史现象完全不是文明起源“多元”推动的结果。

第三，从夏开始“一体”中心主要的所作所为。

从夏代开始，社会的“一体”化逐步深入。一方面，版图扩大了，“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另一方面，中心在“一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显。

其中，对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所作所为。

³³ 裴安平：《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495 页；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3 页。

³⁴ 何驽：《2010 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新进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11 年，第 21 期。

³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北京：《考古》，1981 年第 5 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 1999 年试掘简报》，郑州：《华夏考古》2000 年第 4 期。

³⁶ 裴安平：《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491-495 页。

³⁷ 裴安平：《中国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486-490 页。

³⁸ 佟伟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张》，北京：《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论文集，杜金鹏许宏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1—373 页。

其一，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政治中心的出现，从而出现了周边民族和文化一起“众星拱月”的历史现象。如“禹会诸侯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就是这类景观的再现。因为，这种会议不仅是夏拉拢盟友的场合，也是盟友献媚“中心”的地方。

其二，各地区史前文明起源的“多元”点即城址的数量大幅萎缩。如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最后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共有城址 13 座，总数比屈家岭文化时期少了 4 座³⁹；夏时期即二里头文化时期，至今一座没有；商文化时期，只见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人自己的城一座⁴⁰；西周时期，除远在湖南宁乡炭河里发现了一座当地土著文化的城址以外⁴¹，湖北随枣走廊及两端发现的都是周人的城⁴²。这说明，为了维护“一体”中心的权利和地位，各地的发展都受到了强力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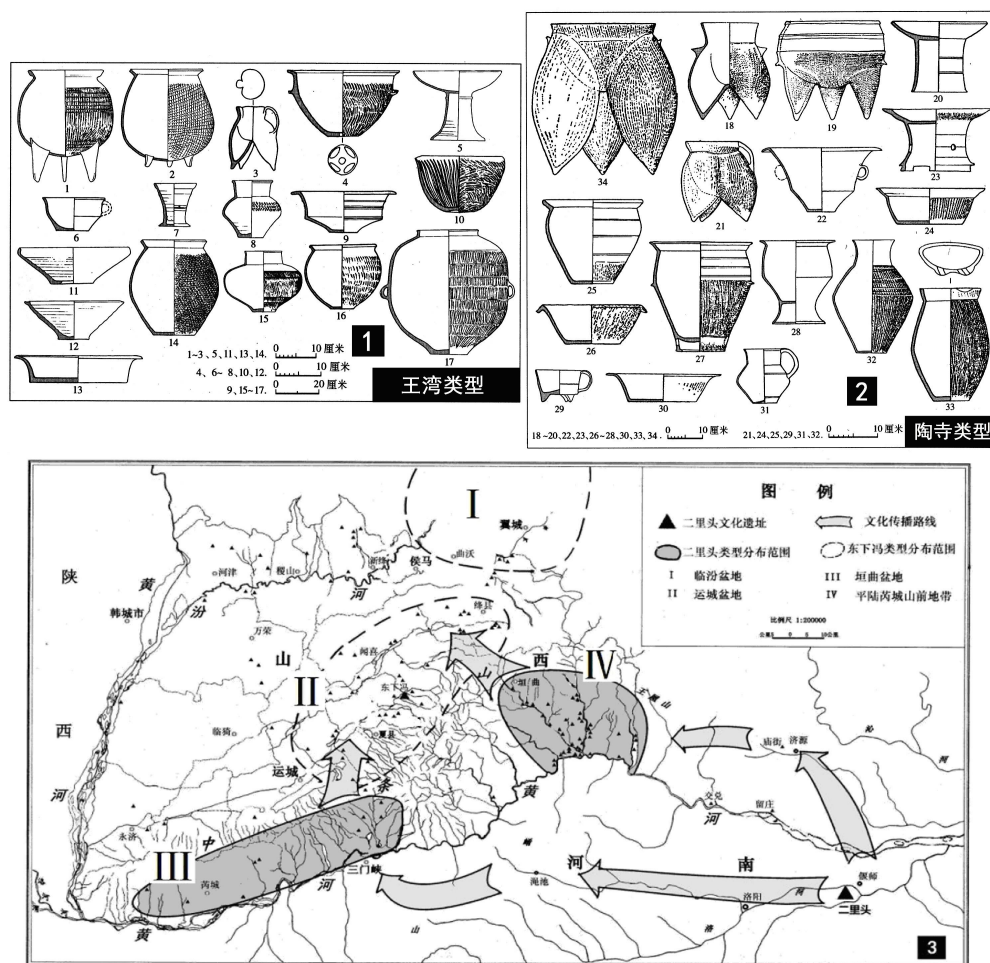


图 2：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山西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器物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扩展态势图
（1、2 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 ■ 新石器时代卷》；3 引自：佟伟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展》；图 3 中虚线圈与灰色区域表示二里头文化的主体范围，均为本书作者所加）

其三，“远交近攻”（《战国策·秦策三》）是“中心”的主要政治行为。

³⁹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66-167 页。

⁴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⁴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物》，2006 年，第 6 期。

⁴² 董敢忠：《麻城市宋埠镇金罗湾发现西周古城遗址》，中国考古网，2016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kaogu.cn/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5/36652.html>。

之所以会在湖北黄陂盘龙城见到纯商文化的城，就因为它是“中心”近攻江南的据点；而之所以会在江西吴城文化⁴³和新干县大洋洲⁴⁴、四川广汉市三星堆⁴⁵等地发现许多包含了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墓葬、祭祀坑等，就因为它们是“中心”鞭长莫及而需要远交的地点和区域。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原安阳殷墟却少见来自这些地点和地区的物品。这说明在“一体”的基础上，伴随“远交近攻”战略的实施，文化因素的流向趋势主要是从中心向外扩散，而不是“中心”在吸收四周先进的因素。

显然，“一体”必有中心，而“中心”则必有一套与之地位和实力相称的举措；而这一切都是史前“玫瑰花瓣形结构”的“中心”所根本不见的。

（三）中原不是史前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

考古发现，史前社会主要有二种“中心”。第一种就是“发展中心”，第二种就是“政治中心”，就是文明社会的“中心”

但是，中原既不是史前的“发展中心”，也不是史前的“政治中心”。

1、中原不是史前社会的“发展中心”

一般而言，“发展中心”就是有关生产、生活与文化某一方面或多方面发展状态比较先进且影响广泛的地点或地区。不过，由于考古资料的局限，目前只能以考古学文化作为“发展中心”的单位。

根据考古发现，史前各“发展中心”所在的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都是独立平等的，相互只有某些因素的交流 and 影响，既不会因为先进的因素而“高人一等”，也不会因为接受了他人的先进因素而“低人一等”。此外，无论空间还是时间这类“发展中心”都是“多元”的，不同时期各地都有自己的强项；如中原豫西距今约6—5千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黄河下游距今约4.5—4千年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长江中游距今约6.5—6千年汤家岗文化的白陶，长江中下游距今约5—4千年凌津滩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都制作精美影响广泛。

正因此，中原地区在整个史前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先进文化因素确实并不多见，所以中原地区不可能一直是史前的“发展中心”，而只可能是某一时段的“发展中心”。此外，中原也不是一方面不停地吸收各地的先进文化因素，而另一方面又不停地输出自己的先进文化因素的“发展中心”。

2、中原不是史前文明的“政治中心”

考古发现，史前“政治中心”有三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只以一定的血缘组织为单位。

由于史前是血缘社会，所以血缘社会活人的“政治中心”只能是以血缘组织为单位，与毫无生命力的考古学文化完全无关。

第二，实力超群。

考古早已证明，无论想在血缘社会中成为组织的“中心”还是一地的“中心”，没有实力都不行。一方面，在血缘组织内部，没有实力就不可能取代血缘长辈管理而实行跨部落的政治管理；另一方面，没有实力也不可能对不同的聚落组织又跨血缘又跨地域实行政治管理和统治。

第三，出现的时间较晚。

大约距今5千年前后才出现；出现的原因就是社会的文明化一体化。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矛盾的激化，聚落组织的规模扩大了，组织方式也一体化了；以往的血缘长辈管理都变成了以实力为基础的政治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政治中心。

⁴³ 彭明瀚：《吴城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⁴⁴ 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⁴⁵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然而，考古发现即使河南发现了“河洛古国”⁴⁶，它也没有成为当地或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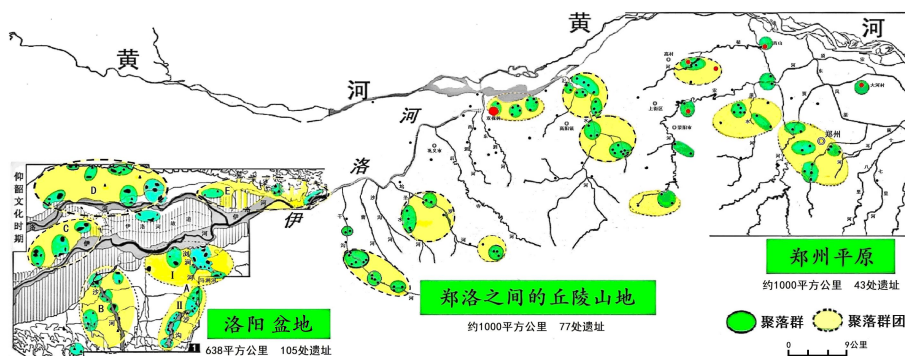


图3：郑洛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郑州平原引自：宋爱平《郑州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分析》，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郑洛之间引自：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遗址形态研究》；洛阳盆地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 2001-2003 年考古调查简报》）

群所在的遗址。此外，双槐树遗址本身内部还共有三处墓地，各自不仅独立性明显，而且多数都面积巨大，都在1万平方米以上。这说明它们很可能就是核心聚落群内不同氏族的墓地。

类似双槐树这样的多聚落遗址在国内早已发现很多，仅湖北距今5000年以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就不少于3例，即荆州阴湘城（2个）⁴⁷、京山屈家岭（3个）⁴⁸、天门石家河（4个）⁴⁹。

这说明，双槐树遗址与那些遗址都处于相似的历史阶段，其之所以会出现以前从未见过的多聚落遗址，并不是因为它们成为了“河洛古国”和中国史前文明起源的“中心”，而仅是因为它成为了分布地域狭小的纯血缘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即永久性部落联盟的核心。

（四）文明起源与考古学文化及“多元”无关

一般而言，文明起源既与考古学文化，也于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无缘。

1、文明起源与考古学文化的性质不同

一般而言，文明起源是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持“文明是一种社会品质”⁵⁰，还是持“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⁵¹观点的人，都不可能认为文明是一种考古学文化现象。因为考古学文化完全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物资遗存的共同体，所以考古学文化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最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了有关遗迹遗物的时空信息，对人类社会文明起源的本身并没有任何影响。如“良渚古国”的崛起就是如此，在其整个的过程中丝毫不见所在良渚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而仅是良渚文化分布区内一块小地方的人类组织和组织的自发行为。

2、文明起源与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质不同

实际上，文明起源不仅与所在具体的考古学文化无缘，也与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

⁴⁶ 秦华：《“河洛古国”遗址发现入选国内十大考古新闻》，郑州：《郑州日报》，2021年1月5日，第1版。

⁴⁷ [日]冈村秀典等：《湖北阴湘城研究（I）》，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69册，1997年。

⁴⁸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2007年调查报告》，武汉：《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⁴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武汉：《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⁵⁰ 恩格斯：《英国现状·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66页。

⁵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2页。

无缘。

第一，出现的原因不同。

促成考古学文化“多元”现象的主要原因与促成文明“多元”现象的主要原因完全不同。考古学文化“多元”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自然的社会环境，而文明起源“多元”的原因，是各个考古学文化中不同人类组织的各自独立活动。

第二，分布地域大小不同。

在“多元”的考古学文化中，仅一个文化涉及的区域就非常广大；而文明起源“多元”的一个人类组织，其地域则非常狭小。如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各自涉及的地域范围就是明证⁵²。

第三，各自区别的标准不同。

区别考古学文化“多元”的标准就是各文化都有形态各异的器物和器物群。

然而，文明起源带来的却是社会等级地位分化，所以每一个文明起源了的组织内部都拥有一套标志社会分化的礼器、建筑和基址。

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现象本质上既不是文明起源“多元”现象的表现与反映，也不会导致文明“多元”现象的出现。

三、中国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与民族“多元一体”无关

最早意识到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对中华民族关系影响深远的就是严文明先生。1986年，他就认为“由于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特色”⁵³。此后，1989年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的发表，就更深化了史前考古学文化与多民族“一体”格局关系的认识⁵⁴。

然而，这种理论和认识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其一，只重形式不重内涵，混淆了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民族压迫剥削周边少数民族痛苦的“多元一体格局”，与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各民族人民独立平等共存共荣幸福的“多元一体”的本质不同；其二，将史前毫无生命力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多元一体”结构视为中国古代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源头和基础；其三，忽视了暴力在历史时期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同步忽视了历史时期民族“多元一体”是一种政治现象的本质。

一般而言，民族是在一定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可分二种类型。一类是自然民族，各组织成员独立分散；另一类是实体民族，各组织成员已合成一种利益一体化的共同体。

由于自然民族各自独立分散，所以历史证明只有“实体民族”的崛起才会影响历史和历史的进程，而实体民族的崛起又与当地人民吃穿用的考古学文化和用品没有丝毫关系。

从夏开始，中原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的“中心”地区，关键的原因就因为那里崛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体民族与民族国家。虽然史前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及其社会发展状况一点都不先进，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以后的“政治中心”。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国家为什么没有诞生在史前一直引领文明与国家起源新潮的长江中游地区？为什么会诞生在中原地区？而在中原地区又为什么会诞生在以洛阳为核心的豫西地区？

就已有的资料而言，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⁵² 周薇等：《刚刚，中国又多了一项世界遗产》，中国新闻网，2019年7月6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19/07-06/8885951.shtml>。

⁵³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北京：《文物》，1987年，第3期

⁵⁴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第一，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中原地区社会矛盾相对平和。

中原地区最大的地理环境优势就是平原与平坦的盆地面积大于山地丘陵面积，河南这二种土地的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55.7%⁵⁵，而在长江中游湖北山地丘陵则占全省面积的80%⁵⁶。显然，人地关系相对宽松，这不仅有利于史前农业的发展，还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正因此，史前城址的数量与规模就表明，中原地区一直就像“台风眼”风平浪静一样，是一个社会矛盾与冲突都不太激烈，且发生的时间较晚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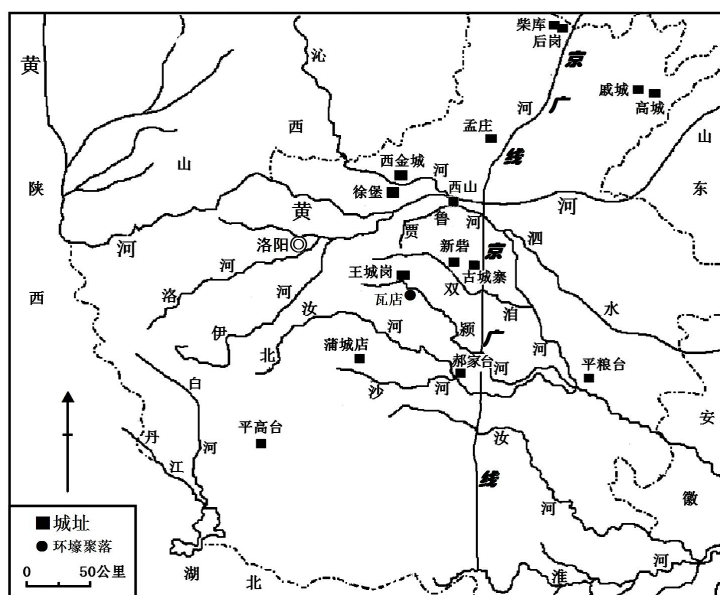


图4：河南史前城址分布图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第二，洛阳盆地已出现古国。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交替时期，洛阳盆地就诞生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⁵⁷，从而为实体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核心力量。

第三，在中原地区，豫西位于社会矛盾激烈冲突地域的外围和边缘。

其一，整个豫西从早到晚就没有一座史前的古城。

其二，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即整个夏朝时期，整个豫西地区也没有一座古城。

其三，根据史前古城的分布位置可知，当时中原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地区就位于现在河南淮河以北的京广线两侧（图4）。

其中，夏民族崛起的地域就位于这条古城分布带的西侧，而商民族崛起的地域就位于这条古城分布带的东北侧。

第四，外族入侵的教训与启示。

距今5000—4500年期间，中原地区曾遭遇了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⁵⁸。

其中，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由东向西横扫了河南中北部。与此同时，与大汶口人打了就跑不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不仅也大举挺进了中原，还强行赶走了原住民，定居在了河南南部全境。

毫无疑问，土地与家园的沦陷不仅是教训，更给了中原人民大规模团结整合起来反抗外来侵略的启示。之所以要“禹征三苗”，实际就是这种觉醒的明证。

第五，长江中游衰落了。

长江中游不仅史前城址发展先进，而且还拥有史前晚期工艺造型最复杂的玉礼器，以及史前中国最早的青铜冶炼技术与器物⁵⁹。此外，也是史前唯一一个有能力大举入侵并长期移民定居中原的自然民族群体。

然而，石家河晚期，长江中游的发展却走到了尽头。由于整体自然环境较差，社会矛盾

⁵⁵ 360 问答：《河南省平原面积有多少？》，<https://wenda.so.com/q/1638226032215728?src=180&q>。

⁵⁶ 百度知道：《湖北面积有多大》，<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94267132799928539.html>。

⁵⁷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91-495页。

⁵⁸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郑州：《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

⁵⁹ 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南昌：《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过于激烈，各地血缘组织长期水火不容，以致终究无法形成统一的实体民族。“三苗”的称呼实际就是当时当地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一体化实体化民族的佐证。

显然，中原的兴起绝不是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的贡献，而是人类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促成中原成为中国政治中心最主要的原因也不是它的地域的中心性，而关键是它成为了中国最早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的跨地域的政治中心；而之所以会成为这样的政治中心，则因为那里崛起了中国最早的第一个实体民族。

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实体民族的崛起意义重大。

第一，改变了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的社会组织状况。

以往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总是同时并存了无数独立平等的小型血缘组织，而实体民族的出现则使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只有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单位，即由无数小型血缘组织共同构成的实体民族。

第二，改变了考古学文化分布区与国家的组织关系。

以往同一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往往同时并存了多个由血缘组织构成的“古国”，但实体民族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这种现象，并出现了民族的分布范围与国家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的历史现象。

第三，由于上述二方面变化，所以就出现了考古学文化、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现象。

第四，出现了中心性考古学文化。

由于考古学文化、民族、国家已三位一体，所以在以往独立平等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就历史性第一次出现了基于实力的等级分化，并出现了“中心”性文化。

第五，出现了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跨地域的政治中心。

由于以往因文明起源而出现的政治单位都是基于小型的血缘组织，所以它所跨越的地域范围很小⁶⁰。但是，随着考古学文化与国家、民族分布地域的重合，新型的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跨地域的政治中心就出现了。

第六，拉开了古代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序幕。

为了消灭或击溃敌对势力，网罗追随者，夏一方面“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史记·五帝本纪》），另一方面又“禹会诸侯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之所以要如此，一是炫耀实力，二是籍此网罗追随者，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就这样，武功与文道同时并举，夏国延续了470余年，为中国历史牢牢地树立了第一个实体民族和国家崛起的榜样，也为中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事实上，历史早就证明血缘社会只能造出“多元”而根本造不出“一体”，“一体”是社会文明化一体化的结果。所以，研究历史必先要复原历史。

值得深思的是，就在中国历史中各种“多元一体”学说不绝入耳的时候，苏秉琦先生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与文明起源的“多元”说。虽然他也认为有些历史民族的前身似就藏身在史前当地考古学文化的范围内；但是，他并不赞成中华民族具有的“多元一体”格局就起源于史前的说法。这说明老先生有着崇高的坚持真理的学术境界和精神。

然而，将人类自然的文化交流圈及所发生的一切都视为政治性的“一体”现象，甚至比司马迁还进步，并将史前考古学文化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都标榜成“文明探源”的重大成果，还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色，明显有违历史的真相。

其实，考古与文献早就证明，中国历史确实存在“多元一体”的历史时代和现象，但长期以来，那主要是帝国大一统的暴力政治所致。对今天而言，虽然这也是一笔政治遗产，需要研究的继承。但是，一定要以人为本，搞清楚以往“多元一体”的性质与历史局限，千万不要提前、夸大和美化了历史现象原本的真实意义。

⁶⁰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61-378页。

